

《新民说》教育思想浅析

李璠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 300191)

摘要: 梁启超是近代以来较早提出系统化教育方略的先驱, 主张德智体美(情)意全面发展, 兼具东西文化之长, 将教育救国的视线转移至普通民主, 擘画出强国之梦的生动画卷, 对当今教育思想变革仍不乏启迪意义。

关键词: 新民说; 梁启超; 教育思想

20世纪初, 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西风东渐、救亡图存的思想背景下, 策动了以“新民救国”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 在《新民业报》发表连载文章《新民说》, 全文共包括公德与私德、权利与义务、进取冒险与毅力等共20节内容, 较为系统的提出新民思想, 旨在培养塑造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 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进而实现国家独立富强。

“新民说”在考量与传播20世纪泰西国家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文学观的基础上, 呼唤中国传统学术革命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而成为近代中国促进国民进步、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思想先导。《新民说》以较为完备的理论风靡学界并倾动群伦, 胡适曾肯定地说自己曾受了《新民说》的无穷惠惠, 郭沫若也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 差不多所有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 完全失掉了它的风采。”李泽厚肯定其“启蒙宣传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并称赞他“做了当时革命派所忽视的广泛思想启蒙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最早系统化提出近代中国教育方略, 确定了以德育为首要, 德智体美(情)意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教学内容上既不醉西风, 又不墨守传统, 以新民之梦描述了一幅强国富民的美丽画卷。¹

一、“新民”思想的教育理念

梁启超的“新民”对象经历了由官至民的转变。维新变法期间, 梁启超竭力赞助陈宝箴、黄遵宪等倡行新政, 参与筹办《南学会》和《湘报》, 力主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 并指出“即今日欲开民智, 开绅智, 而假手于官力者, 尚不知凡几也, 故开官智, 又为万事之起点。”变法失败使梁启超认识到自上而下的变革是行不通的, 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国民缺乏公德, 智慧未开, 因此将视线转移至广大国民。“国也者, 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 涣散混浊, 而国犹能立者”, 因此, “欲其国之安富尊荣, 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梁启超认为要“挽浩劫而拯生灵”非“新造吾国民不可”, “为中国今日计, 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 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 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 皆可与彼相埒, 则外自不能为患。”在烽火连天的世纪之交, 梁启超竭力主张“新民”的原因也在于此。

梁启超的“新民”重点经历了由开民智向新民德的转变。清代末期, 严复是最早提出“新民”并大力予以倡导的学者, 他在引入斯宾塞的理论学说时指出, 一国之贫富强弱治乱, 归根到底取决于民力、民智、民德之高下, 国家富强之源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三者之中, 以“开民智”为最急, 以“新民德”为最难。梁启超对此深感赞同, 并在1897年给严复的信中写道, “今而知天下爱我者, 舍父师之外, 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 舍父师之外, 无如严先生。”对于“开民智”, 梁启超曾大声疾呼“权者生于智者也, 有一分之智, 即有一分之权, 有六七分之智, 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 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进入20世纪, 梁启超敏锐察觉到, 中西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器

物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的差距, 更在于深层次的国民思想道德水平的差距。人不徒有“形而下”的生存, 更应有“形而上”的生存, 泰西立宪国家有国民而无奴隶, 在专制中国则有奴隶而无国民。因此学习西方应从思想入手, “精神不存, 则形质无附”。1902年,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 以“中国之新民”自称并肩负起推进道德革命的重任, 以图“发明一种新道德, 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 坚信“新道德出焉, 而新民出焉”。

二、“新民”思想的教育措施

一是提倡“群育”教育观。在“爱国如焚, 需饮冰止之”的梁启超看来, 教育无疑是新民德的不二法门, 因此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 达到改良中国的目的。“他事无宗旨尤可以苟且迁就, 教育无宗旨, 则寸毫不能有成。”对于教育的培养目标, 梁启超认为新世纪的教育宗旨应该转向受教育的主体和目标——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目的就是提高作为人的人”。他强调“中国第一要务”就是通过教育培养一代新的国民, 这种“新民”“备有人格”, 德智体意美(情)兼具, “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 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 为世界之民而非陋谷之民”。²

梁启超深刻认识到, 中国人群体意识和国家观念十分薄弱, 而这正是导致国家民族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其文章中积极阐发倡导群体观念的重要性, 以期启发教育国民。近代“群”观念的出现并引起知识分子关注始于严复, 他在《原强》中介绍西方的社会学时将其译作群学, 同时基于西方社会学对“群”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 并将个体与群体作对比进行讨论。他以砖与墙, 分子与矿物质, 细胞与动植物比拟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表示群体重于个体。在《天演论》中严复说到: “两害相权, 己轻群重”, “群己并重, 则舍己为群”。在严复的影响下, 梁启超认为培养德智体固然可以增强国民素质, 然而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亦或“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 亦或“高谈哲理以乖实用”, 以如此之国民不足以与外国列强竞争, 因此施以群体性教育, 淬炼其习性, 培养其忠于国家的群体意识。《新民说》的总体构架正是以利群为核心, 以公德与私德为两条主线进行的。无论是权利与义务思想, 国家思想与政治能力, 还是自尊与毅力, 都与“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见, “群”既是新民学说的出发点, 也是新民学说的落脚点。³

二是主张开办新式学校。梁启超认为教育的重要性在于, 通过教育改变中国落后状况比政治改革更为有效, 而且实现新民理想离不开基础的国民教育, 因此发展教育才是当务之急, 但以中国的教育体制, 无论是从教育内容还是考试制度都与新民思想背道而驰。因此, 梁启超新民的的第一步便是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 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 兴办学校, 引入西学。“欲兴学校养人才, 以强中国, 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二十年中, 洋务派的官员们已经开始致力于引进西学, 创办西式学堂。甲午战败后, 清政府在全国范围推广新式学堂, 教学内容逐渐效法西方, 增加数学、音乐、体育等学科, 然而实际情况与办学目的相差甚远, 教育改革收效甚微, 梁启超对此十分不满, 痛陈“学堂之总

办提调,大率皆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有教育如无教育”。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激发了志士仁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自强意识,同时其先进的思想理念也使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众多先进分子清醒认识到,教育为自强之道,育人为自强之机。梁启超认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其对新式学校的重视可见一斑。戊戌维新时期,他参与了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在日期间主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以提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英法名著为教材。通过考察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梁启超认识到日本迅速崛起与其学校教育培养的大批现代化人才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参照日本对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规划设计,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并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在《教育政策私议》中,提出将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按年龄段划分为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成人期,分别对应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雏形。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实行义务教育的主张,展现其在教育方面无可比拟的前瞻性。

三是开办报社引进西学。办报宣传是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梁启超最侧重的一种方式,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最具时效性和影响力的传播媒介,他认为报刊“对于国民而为其响导者”。梁启超指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可见其对报刊宣传作用的重视程度。从《时务报》、《清议报》乃至《新民丛报》,他不但主持创办报刊,还一直担任主笔撰写文章宣传新民思想,他的绝大部分文章也正是在报刊发表并广为流传。1901年,梁启超撰写《卢梭学案》一文并在《清议报》11月、12月两期连载,较为深入地研究卢梭国民教育与改造的启蒙思想,随后发表在《新民丛报》的《新民说》也是如此。这些文章介绍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给当时处于闭塞中的中国民众打开了一扇科学认识世界的窗口,从更加广阔的层面对民众进行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启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价值准则,不断引导并促进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

针对中国人在长期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的国民劣根性,梁启超在引进西学方面也相当具有深度及针对性,涉及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学术思想等多个领域,旨在向中国展现一个尽量完整全面的西方的同时,为国民梳理新的道德规范。他先后撰述《政治学学理摭言》《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赫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意大利三国三杰传》等。据统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的西方学者、思想家、科学家就在百人以上。这些译著较为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的价值观、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及社会学领域的一些常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国民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启蒙作用。

三、“新民”文学载体革命

近代报纸媒介的兴起,不仅为梁启超提供了启蒙民众的重要平台,同时也为其发动文学革命提供了重要契机。梁启超将此前在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文人之文与汉学家述学之文,都归于“传世之文”的行列,认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觉世之文”才最适合变革中国的政治课题要求,“新民体”由此产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自己也概括了“新民体”的特点: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俗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低为“野狐”。然其文

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尽管“新民体”不是梁启超一人所为,同时代作家多有参与,但无疑梁启超的贡献最大,且是这一文体的集成者。狭间直树指出,这一文体其价值直接作用于现实的“政治课题”,其内核是“西方近代文明”,而其语体则为“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语体。

在此影响下,梁启超于1902年11月创办《新小说》,将戊戌变法前开始的“小说界革命”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大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启蒙和教育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带头写作《新中国未来记》,融合演讲、辩论、游记、新闻、译诗等多种文体,通过分别主张改良和革命的两个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理想。尽管小说的创作未能取得成功,但其对小说的改革期待获得了社会的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与新民救国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和阅读需要,各类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纷纷问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大家族。

此外,受时代风气影响,梁启超在使用“小说”概念时,也常常包含戏曲。在谈及小说界革命时,常将《西厢记》、《长生殿》与《水浒传》、《红楼梦》相提并论。戏曲与小说都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文体特征,而曲本在梁启超看来更是中国韵文学进化的巅峰,因此戏曲应该和小说一样,作为“新民救国”的载体。1902年前后,梁启超亲自操刀戏曲革新,创作了《劫梦灰》、《新罗马》、《侠情记》、《班定远平西域》等剧本,并在《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刊载。“借雕虫之小计,寓道铎之微言”,梁启超在每一部剧中,都对启发蒙昧、改良群治的创作宗旨再三致意。他的剧作不仅重视议论寄托,充满情感张力,且开创了“以中国戏演外国事”的先例,影响甚远。借三尺舞台演绎中外兴亡故事,以曲词宾白叙写新民救国情怀,成为文人的一时风尚。

梁启超揭开了20世纪初文学革命的序幕,这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在促进社会变革实现新民德方面,梁启超既是思者,又是行者。面对西学东渐的急风骤雨,梁启超乐观地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迎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充我宗也。”这也正呼应了梁启超“新民”二义,即“淬厉其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本无而新之”⁴,最终实现泰东文明与泰西文明结合的最高境界——兼容并包、为我所用,从而为后世教育发展确定了方向与路径。

参考文献:

- [1]孙文学,《〈新民说〉与梁启超的教育方略》[J].《教育史话》,2002年第11期:50.
- [2]黄敏兰,《梁启超对现代教育事业的开创性贡献》[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9期:14.
- [3]陈泽环,《〈新民说〉的当代意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5.
- [4]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 李璠 性别:男 民族:汉族 籍贯:天津市 出生年月: 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市南开区 学历:博士研究生 职称: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邮编:300191